ChinaXiv 许可声明确认及个人承诺

1. 版权承诺

- [x] 作为本文的作者提交。
- [ ] 虽然不是作者，但确认有进行提交的权限。

2. 许可声明

在您的文章提交之前，你必须选择一个许可证或声明，给我们相应权利来分发您的文章（更多信息可访问"许可证讨论区"）。

- [x] 中国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非排他性的、不可撤销性的许可来分发本文章（中国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所需的最小权限，除非您了解其他许可证的影响，请选择此项。）
- [ ]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CC BY 4.0)
- [ ]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Alike license (CC BY-SA 4.0)
- [ ]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license (CC BY-NC-SA 4.0)
- [ ] Creative Commons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CC0 1.0)

3. 政策声明

1.我接收提交文章一旦被接受，将不能完全被删除。
2.我明白中国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有权重新分类或拒绝任何提交的权利。
3.我愿意我提交的文章将与中国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的其他文章自动查重。

- [x] 我同意"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论文许可协议"及以上声明。

4. 诚信承诺

- [x] 本人已经完整阅读"ChinaXiv 论文提交者、论文评议者基本准则"，郑重承诺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此准则，如有违反，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同意 ChinaXiv 的处理办法。

承诺人：刘怡婷

签署日期：2022.4.18

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影响：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分析

刘怡婷[1]　范洁琼[2]　陈斌斌[1]

（[1]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上海 200433）

（[2]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及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分中心，上海 200062）

摘　要： 共同命运模型（common fate model, CFM）是在家庭或二元层面研究中值得信赖的模型，其更好地解释了亲密关系内在的相互依赖性。本研究基于共同命运模型探讨了家庭整体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程度的影响，以及教养能力感在两者间的跨层中介作用。采用问卷法分层整群抽取上海市幼儿园中孩子（平均年龄 5.14 岁，年龄范围 4～7 岁）的父亲与母亲参与调研，分两个时间段（T1，T2；间隔 1 年）收集数据，最终得到 650 个家庭的父亲、母亲的婚姻满意度问卷（T1），教养能力感问卷（T2）和协同养育感知问卷（T2）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 基于共同命运模型，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并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2) 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正向预测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3) 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并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4) 父母个人层面的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起中介作用。总之，本研究基于追踪数据运用共同命运模型，并结合家庭层面（婚姻质量和协同养育）和个人层面（教养能力感）探讨了教养能力感在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间的跨层中介效应，为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与指导意见，并进一步促进了共同命运模型发展。

关键词： 婚姻质量，支持性协同养育，破坏性协同养育，教养能力感，共同命运模型

分类号： B844

1

收稿日期：2021-12-03

*本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32171068]、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基金项目 [21YJCZH009; 18YJCZH027]与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重大成果培育性项目[2020-02-013-BZPK01]的支持。本文系复旦大学“双一流”学科重点项目“面向社会转型与治理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创新平台”的研究成果之一。

刘怡婷、范洁琼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范洁琼，E-mail: jqfan@pie.ecnu.edu.cn；陈斌斌，E-mail: chenbinbin@fudan.edu.cn

1 引言

Gottman 和 Notarius（2002）研究表明，夫妻婚姻满意度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开始显著下降，而父母良好的婚姻质量是维持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不仅影响着夫妻双方自身的状态，还影响着孩子的成长（Erel & Burman, 1995; 王斯麒 等, 2022）。当孩子处于幼儿阶段时，父母的教养方式正处于探索和动态变化中（Davies et al., 2004），而目前现代中国正常家庭中，有孩子的大部分年轻父亲和母亲不仅要完成工作，还需要分配相应的时间与精力来照顾孩子。因此，父母通过建立共同养育关系来分担抚养孩子的责任（Feinberg, 2003），平衡工作与生活，尤为重要。

协同养育（Coparenting）是指父母双方协调好父母角色，合理分工来共同养育儿童，它是一种家庭中承担父母角色的成人关系（Schoppe-Sullivan et al., 2004; 陈斌斌, 施泽艺, 2017）。协同养育包括支持性的协同养育（Supportive Coparenting）和破坏性的协同养育（Undermining Coparenting）（Stright & Bale, 2003）。支持性的协同养育表现为父母双方对对方教养孩子的支持，包括肯定对方作为父母的能力、承认和尊重对方的贡献、维护对方的养育决定和权威（Belsky et al., 1996; McHale, 1995）。破坏性的协同养育表现为父母双方对对方教养孩子的不支持，以批评、贬低和责备等来削弱对方（Feinberg, 2003）。有些父母会采取具有破坏性的竞争方式让自己获得孩子教养过程中的权威，而使对方失去资格（Ihinger-Tallman et al., 1995）。已有研究发现，协同养育对儿童的认知（Cabrera et al., 2012）、情绪情感（Teubert & Pinquart, 2011）及问题行为（Chang et al., 2004; Riina & McHale, 2014; 卢富荣 等, 2019）等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关注正常家庭中父母双方协同养育尤为重要。

1.1 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影响：基于共同命运模型

婚姻质量通常包含夫妻对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满意程度，对组成家庭联盟的另一方成员是否满意的评估（Schumm et al., 1986; Fourmier & Olson, 1983）。婚姻质量越低的父母往往会出现更低的婚姻满意度（Gottman, 1993b）。大多婚姻研究学者选择使用婚姻满意度作为衡量婚姻质量的标准（Gottman & Notarius, 2002; 邢凯 等, 2019; 杨晓静 等, 2021），强调个体对自身婚姻质量的主观感觉，聚焦于婚姻总体的评价。并且，研究已表明，婚姻满意度与父母协同教养关系密切（Pedro et al., 2012）。根据本研究评价婚姻整体情况的需求和研究目的，本研究选取婚姻满意度来考察夫妻间的婚姻质量，以更有力地揭示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教养之间的关系。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家庭是由婚姻子系统、亲子子系统、兄弟姐妹子系统构成的层级组织系统，各个子系统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某一子系统的情绪和行为动态会对其他子系统的功能产生影响（Cox & Paley, 1997）。从家庭系统的角度看，婚姻质量从属于婚姻子系统（Cox & Paley, 1997），婚姻质量会有助于促进其他子系统的发展（Cox, 2010）。婚姻中夫妻双方如何共同养育子女就属于家庭中一个重要其他子系统（McHale et al., 1996）。婚姻质量是所有已探讨的影响因素中对协同养育最有效的预测源（Mangelsdorf et al., 2011），反映婚姻关系与质量的婚姻满意度正向预测良好的协同养育（Pedro et al., 2012），但研究者在家庭层面提出探讨共同育儿的问题后，具体分析却在父、母两类个人层面的模型进行。研究也发现，在同一时间段内，父亲或母亲在体验到让自己感到满

意、稳定的婚姻关系后，其更倾向于产生团结、一致的协同养育，减少在协同养育中的冲突和贬低行为（卢富荣 等，2019）。该研究从家庭层面提出问题，虽然将父母具体分析体现于一个模型中，但是仍在探讨父母个人层面间的影响。本研究则进一步从家庭层面对两者间的关系提出问题与具体分析。

研究者需要重视的是，家庭中的父母双方之间会存在相互依赖（例如，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是在这段关系里联系在一起的），而并不独立。Bronfenbrenner（1988）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家庭成员的不同经历共同塑造了家庭的生态环境和氛围，它反过来又会影响家庭各个成员的发展和变化轨迹（陈斌斌 等，2016）。家庭层面的作用机制最终会落到个体层面，而个体层面又会反过来影响家庭层面，形成一种循环，两者由此可达成融合统一。Gottman（1993a）提出的“平衡理论”表明家庭中父母的态度与行为会被相互影响，若一方有消极行为出现，随着另一方积极情感的表达与积极行为的出现，则会逐渐平衡消极行为带来的指责、敌意的影响，双方均卷入家庭以共同探讨达到平衡，维护婚姻状态与家庭生态（琚晓燕 等，2020）。家庭研究学者往往在家庭或二元层面提出研究问题，但分析却在个人层面上进行（Galovan et al.，2017）。因此，Ledermann 和 Kenny（2012）呼吁更多的家庭或二元层面的研究，采用共同命运模型（common fate model，CFM；Kenny & La Voie，1984；见图 1）来研究亲密关系，以更好地解释其内在的相互依赖性。

共同命运模型是一种研究方式，基本假设是一个变量会影响关系中两个或两个以上伙伴，这种影响对每个伙伴可能是相似的（共享的）或不同的（独特的）（Ledermann & Kenny，2012）。此处研究变量称为共同命运变量，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在该变量的影响下彼此相似，产生相互依赖（Galovan et al.，2017）。共同命运模型基本内容是探讨群体层面上的相互依赖，模拟了群体之间如何相互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群体之间关系与发生的事情（Kenny，1996；Ledermann & Kenny，2012）。共同命运变量通常被建模为具有两个指标的潜在变量——每个二元成员的作答数据作为一个指标来进行分析，并且，潜在变量中的每一个因子负荷均被固定为 1，以保持统一（Galovan et al.，2017）。

已有研究表明，共同命运模型研究方式可以帮助研究家庭和亲密关系学者解释家庭层面因素对个人或家庭的影响（Galovan et al.，2017）。国外的家庭或亲密关系领域，Preotu 和 Turliuc（2013）采用共同命运中介模型探寻伴侣沟通在伴侣相似性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Galovan 等人（2017）采用共同命运混合模型（包含个人层面和家庭/二元层面）探寻家庭环境混乱如何相联系于夫妻冲突解决和儿童行为问题，以及 Brown 等人（2017）采用共同命运混合模型研究异性恋夫妇对色情制品接受、使用与性满足的关系。在国外的非家庭与亲密关系领域，Li 等人（2020）采用共同命运模型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Kenny & Ledermann，2010）探寻了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感知的治疗协作联盟与咨询质量之间的关联。

对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它也是探索二元关系中相互依赖，对成对数据进行分析，但仍是聚焦个体内与个体间效应的个人层面研究（Kenny & Ledermann，2010；刘畅 等，2016）。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更好地捕捉到每一个二元成员的感知如何取决于自己与对方的感知，而共同命运模型更好地捕捉与强调二元成员共同认知的影响（Li et al.，2020）。研究表明，咨询师与来访者共同感知的治疗协作联盟能显著预测咨询质量，其效应大小明显大于个人认知，并反映了治疗过程中合作与共识的重要（Li et al.，2020）。目前，国内已

有研究采用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对婚姻质量与协同养育之间的影响进行了个人层面的探索（刘畅 等, 2016），但仍未有对婚姻质量与协同养育间更精准的家庭共同感知层面的探索。同时，国内还未有采用共同命运模型的相关研究，有待本土化深入。

此外，虽然大多支持理论的证据来源于个人层面的分析，但是其相关理论内容均是出于家庭或二元层面。共同命运模型也使原在个人层面分析的概念得以在家庭/二元层面上重新概念化（Galovan et al., 2017），更精准地探索变量间的理论联系，在家庭与亲密关系的研究中考虑更加周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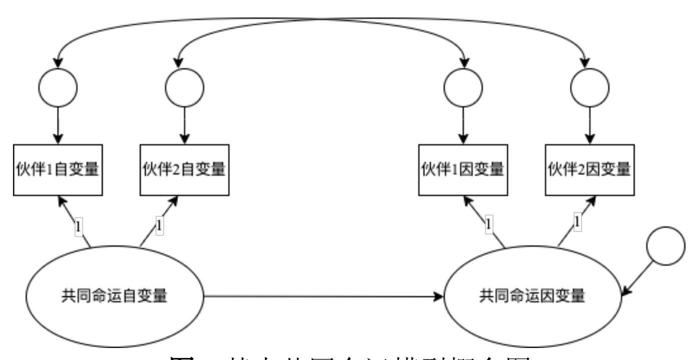


图 1 基本共同命运模型概念图

注：指标变量截距是自由估计的，共同命运变量的潜在平均值或截距被固定为 0。

图片来源：Galovan, A. M., Holmes, E. K., & Proulx, C. M. (2017).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relationship research: considering the common fate model. *Journal of Social &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4*(1), 44-68.

根据 Ledermann 和 Kenny（2012）提出的采用共同命运模型的两个先决条件表明，（1）共同命运变量是必须对双方成员产生影响的变量；（2）可以观察到的数据必须是潜在共同命运变量的可靠指标。从人格特质角度分析，个体人格特质对婚姻质量的感知既存在主体效应（the Actor Effect）的影响（Kenny, 1996），又存在对方客体效应（the Partner Effect）的影响（陈媛 等, 2020）。夫妻作为婚姻共同体，夫妻双方影响婚姻质量，婚姻质量属于共同命运变量。夫妻双方对婚姻质量感知的作答可以作为可靠指标。由认知——情感加工系统模型（the Cognitive-affective Processing System Model）可知，配偶的人格可以与自己的人格相互作用，以相互影响行为（Zayas et al., 2002）。父亲与母亲的协同养育行为会受到相互影响，父母协同养育属于共同命运变量。父母双方对协同养育的作答可以作为可靠指标。由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从生态系统理论和相互依赖性的角度进行新的思考，从家庭层面出发探讨家庭整体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程度的影响。

研究假设 1：基于共同命运模型，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并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整体婚姻质量越高的父母的共同的支持性协同养育程度越高，共同的破坏性协同养育程度越低（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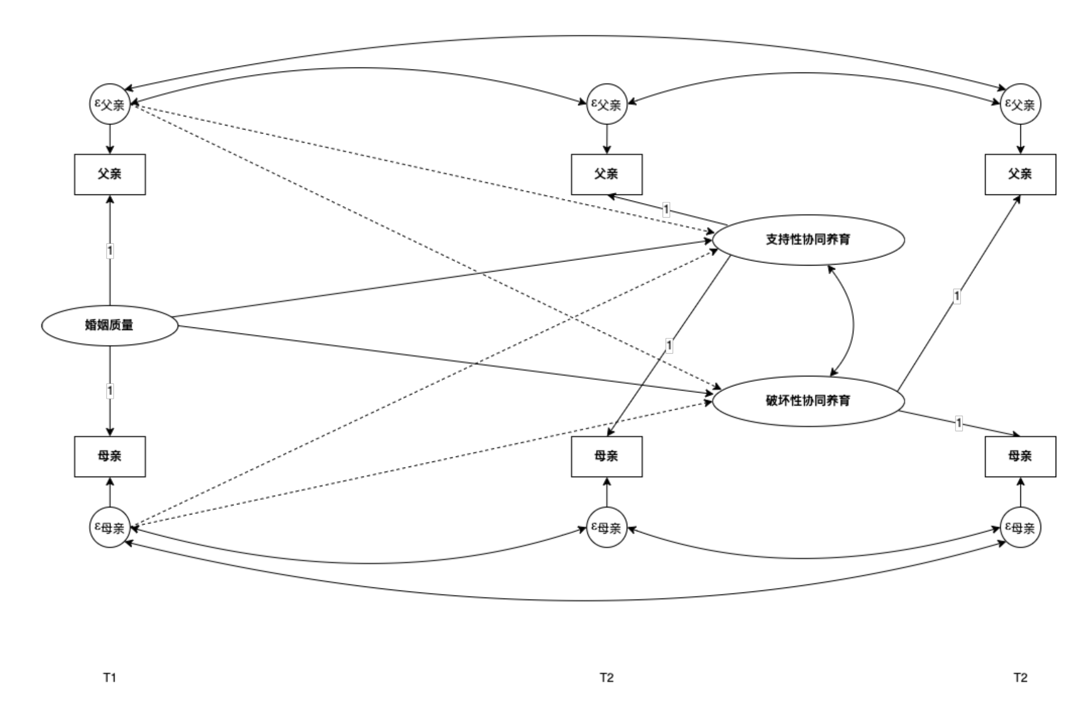


图 2 基于基本共同命运模型的假设模型

注：基于基本共同命运模型的假设模型实线代表了父亲和母亲家庭（二元）层面的方差估计即所报告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对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的影响路径。虚线代表了父亲或母亲个人层面的婚姻质量方差估计（ε）对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的影响路径。

1.2 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影响：教养能力感的中介作用

那么，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之间是否存在内部的影响机制呢？Bandura (1977）的自我效能理论认为，个体感知到的通过其行动获得期望结果的能力会激励个体努力，并坚持下去。已有大量文献支持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父母的角色（例如，Jones & Prinz, 2005; Dekovic et al., 2010)。教养能力感指父母对自己作为父母的评价，通常被定义为父母教养角色中的满意度（教养满意度，Parenting Satisfaction）和父母教养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教养效能感，Parenting Efficacy）(Johnston & Mash, 1989)。教养能力感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认知功能（Jones & Prinz, 2005)，父母了解自己的内在能力，增强自己称职地履行父母角色的意识，可以使父母双方对处理困难情况的能力有更大的信心（Frank et al., 1986)，从而成为更称职的父母。教养能力感与家庭功能息息相关（van Eldik et al., 2017)，但其影响机制却知之甚少。因此，本研究关注父母教养能力感和家庭动态之间潜在的互动过程，并聚焦于父母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之间的影响。

家庭系统理论中的相互依赖与影响表明父母教养子系统中角色的能力感与婚姻功能之间存在重要联系（Cox & Paley, 2003)。婚姻子系统中的婚姻质量有助于促进亲子子系统的发展（Cox, 2010)，婚姻质量高的父母在家庭中倾向于表达更多的积极情绪，开放性的交流与情感表达便于父母觉察孩子的需求，给予孩子指导与鼓励，履行较好的教养角色，增强与孩子间亲密关系（张晓 等, 2017; 杨晓静 等, 2021)。已有研究表明，家庭中伴侣支持和婚姻维持行为被认为是教养能力感的重要预测因素（Suzuki, 2010; Merrifield & Gamble, 2013)，婚姻质量高的父母懂得彼此支持与理解，维持良好的婚姻行为，更有可能接受与认可

作为父母的目标与期望，进而引导自己作为父母角色的意识与履行相应职责。同时，研究表明，父亲婚姻质量可正向预测父亲教养能力感（Bouchard & Lee, 2000）。邢凯等人（2019）研究表明，父亲婚姻质量越高，对孩子的教养角色感知越高，进而父亲对孩子的养育投入越多，以此拥有良好的父子关系。从长远来看，婚姻质量不佳形成的婚姻压力和孩子外化行为正随着时间的进程共同发展，父母教养能力感可以帮助解决由婚姻质量不佳造成孩子行为问题（van Eldik et al., 2017）。

对于属于教养能力感一部分的教养效能感，父母婚姻质量与其教养效能感存在正相关（Kwan et al., 2015），但是，母亲婚姻质量与父亲的教养效能感存在负相关，随着母亲婚姻满意程度下降，父亲对养育子女的自我效能感程度增加（Kwok et al., 2013）。那么，父母整体婚姻质量对父母各自教养能力感有怎样的联系呢？从家庭层面考虑，对于共同感知到婚姻质量高的父母，双方融于家庭相互影响，是否会更适应自己的角色并在抚养孩子的认知层面积极感知呢？本研究将据此进一步探寻两者间的联系。

研究假设 2：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正向预测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家庭整体婚姻质量越高，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程度越高。

与此同时，根据 Bandura（1997）对自我效能感的理论定义，教养能力感可能影响父母行为上的信念、选择和维持程度（Dekovic et al., 2010）。首先，当教养能力感与一系列积极的父母教养行为相关联时，这些行为会给家庭带来理想的结果（Jones & Prinz, 2005; Christina et al., 2019）。其次，研究表明，父亲与母亲的教养能力感与父母支持性协同养育显著正相关，与父母破坏性协同养育显著负相关，即较高水平的教养能力感的父母拥有更多的支持性协同养育，较低水平的教养能力感的父母拥有更多的破坏性协同养育（Solmeyer & Feinberg, 2011）。父亲与母亲拥有更积极的养育认知（例如，更强的父母教养能力感）时，可能父母会有更佳的协同养育行为。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加强对协同养育子女的主观（满意或享受）反应和客观（行为或能力）的理解，可能预防有问题的协同养育行为，提升可以相互指导和示范的支持性协同养育技能和策略，以及改善可能导致儿童负面结果的破坏性协同养育行为。

研究假设 3：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并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越高，父母共同的支持性协同养育越高，共同的破坏性协同养育越低。

对于双方或多方成员都影响变量的研究，共同命运模型值得更多的关注。从理论上可知，相互依赖关系的性质可以代表群体层面的现象，其共同命运变量也既可以代表双方在变量上的相似性，双方指标上的潜在变量中不同的残差也可以描述为共同命运变量所不能捕捉的个人内部的独特变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方法的使用将更好地符合理论假设，并在家庭和关系研究的许多实质性领域的研究基础上增加更多的理解。

对于教养能力感，父母双方在教养能力感中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互作用。但相对而言，教养能力感评估的是父母双方个人的养育认知，其更具独立性，考虑为共享的家庭层面变量有所欠妥。本研究将其考虑在个人层面进行分析，不为共同命运变量更为恰当。从数据分析的角度，研究者也可以通过两指标间的内相关度来再次确认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变量。当父母双方报告相同变量的指标间具有高相关性时，可以表明其拥有大量共同变异，因此可以预计产生可靠的处于家庭/二元层面的共同命运的估计（Ledermann & Kenny, 2012）。当父母双方报告指

标间相关性较低时，该变量可以不进行共同命运的分析，将其依旧处于个人层面进行探讨。个体层面与家庭层面统一的前提在于个体层面的变量可以对双方或多方成员都有影响并且具有可靠的指标，可以考虑转化为家庭层面的视角进行更严谨地分析，以此有效地将两者融合。

综上所述，在父亲与母亲形成的个人教养能力感对家庭整体运作的影响上，婚姻关系幸福、婚姻质量高的父母相互依赖，双方更可能在育儿上均拥有深刻的理解以及具有一定的育儿自信，更有可能在家庭中支持和认可彼此的育儿努力，避免恶意破坏对方的育儿方式，形成良好的共育环境与共育行为。

研究假设 4：父母个人层面的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起中介作用（见图 3）。

本研究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中介模型，从“家庭层面——个人层面——家庭层面”跨层次分析，更贴近实际地探讨了婚姻质量如何对父母协同养育产生影响，并且，教养能力感可以作为其中有效的干预目标（Christina et al.,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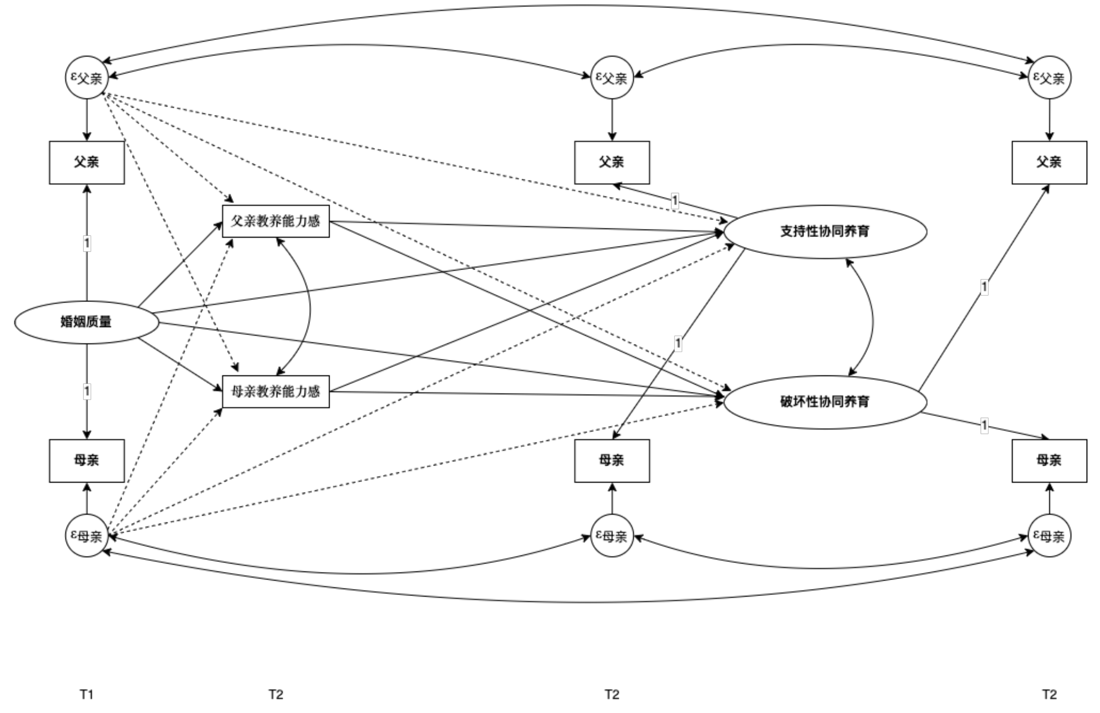


图 3 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假设模型

注：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假设模型实线代表了父亲和母亲家庭（二元）层面的方差估计即所报告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对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的影响路径，以及对父亲和母亲个人层面的教养能力感的影响路径。此外，实线还代表了父亲和母亲个人层面的教养能力感对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的影响路径。虚线代表了父亲或母亲个人层面的婚姻质量方差估计（ε）对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的影响路径，以及对父亲和母亲个人层面的教养能力感的影响路径。

从发展的角度看，婚姻质量、教养能力感与协同养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家庭环境的变化而变化（Riina, 2011），正处于探索阶段。因此，采用纵向设计有助于更清晰地揭示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间的关系。

此外，根据性别角色理论，父母在性别刻板印象影响下会对男孩与女孩的要求有所差异，（刘斯漫 等, 2018），可能对其协同教养产生影响。家中孩子性别对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间的影响还缺乏研究予以探讨。并且，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优化，夫妻开始可以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陈斌斌 等, 2016；新华网,

2021)，家中孩子数量可能对父母的态度与行为产生影响(Chen, 2020; Chen et al., in press)。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在共同命运模型下对家中孩子性别与家中孩子数量是否对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间产生影响，并也进一步探讨了是否对教养能力感中介效应产生影响。

总之，本研究收集父母双方数据进行研究，(1) 运用共同命运模型从家庭层面对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之间纵向关系进行验证；(2) 基于追踪数据，结合家庭层面（婚姻质量和协同养育）和个人层面（教养能力感）的来探讨教养能力感在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间的跨层中介效应；(3) 进一步探讨子女的性别、家中孩子数量等是否对婚姻质量、教养能力感和父母协同养育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上海核心区、中间区和边缘区，根据幼儿园园所密度和园所等级（示范园、一级园和二级园）进行分层整群抽样，最终共抽取 12 个幼儿园参加本次研究。在两个时间段（T1 和 T2，两个时间段间隔 1 年），本研究向幼儿园中孩子的 721 个家庭父亲和母亲收集了相关问卷数据，经过被试流失、无效数据（胡乱填写和大面积未填写）作答的仔细筛选，以及基于本研究背景需要，剔除单亲家庭（13 个家庭）、重组家庭（5 个家庭）的被试群体，最终获得 650 个有效普通家庭数据（包括父亲和母亲），数据整体回收率 90.15%。其中，在孩子出生时，父亲的平均年龄为 31.48±4.28 岁，母亲的平均年龄为 29.52±3.77 岁。在家庭初次调研时，家中孩子的平均年龄为 5.14±0.74 岁，年龄范围 4～7 岁。被试基本人口统计学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被试基本人口统计学信息（*N*=650）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孩子性别	男	308	47.4
	女	342	52.6
是否与祖辈同住？	是	375	57.7
	否	275	42.3
孩子爸爸的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3	0.5
	初中	15	2.3
	中等职业/技术/师范学校及以下	22	3.4
	普通高中	26	4.0
	大专	116	17.8
	本科	323	49.7
	硕士	129	19.8
	博士	16	2.5
孩子妈妈的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2	0.3
	初中	12	1.8
	中等职业/技术/师范学校	18	2.8
	普通高中	33	5.1

	大专	143	22.0
	本科	356	54.8
	硕士	76	11.7
	博士	10	1.5
孩子爸爸的每周工作时间	少于 20 小时	17	2.6
	20～39 小时	70	10.8
	40～49 小时	375	57.7
	50～59 小时	126	19.4
	60 小时以上	61	9.4
	缺失作答	1	0.2
孩子妈妈的每周工作时间	少于 20 小时	80	12.3
	20～39 小时	95	14.6
	40～49 小时	395	60.8
	50～59 小时	54	8.3
	60 小时以上	23	3.5
	缺失作答	3	0.5
家庭平均月收入	2000 元及以下	5	0.8
	2001～5000 元	11	1.7
	5001～8000 元	18	2.8
	8001～10000 元	30	4.6
	10001～15000 元	87	13.4
	15001～20000 元	117	18.0
	20001～50000 元	279	42.9
	50001～80000 元	66	10.2
	80001～100000 元	16	2.5
	100001 元以上	21	3.2
家中孩子个数	1 个	447	68.8
	2 个及以上	169	26.0
	缺失作答	34	5.2
参与本研究孩子在家中排行	第一	532	80.5
	第二	92	14.2
	第三	1	0.2
	缺失作答	34	5.2

2.2 研究工具

2.2.1 婚姻满意度问卷

采用 Fowers 和 Olson（1993）编制的婚姻满意度问卷（The ENRICH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的婚姻满意度中文版子问卷（测量婚姻关系中的和谐与满意程度）来评估父母自己感受到的婚姻质量（汪向东 等，1999），共有 10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1”代表“很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该问卷是被设计用来测量二元层面（Fowers & Olson，1993）（例如，“我非常满意我们作决定和解决冲突的方式”，其中“我们”指代“您和您的配偶”，可作为测量二元层面的问卷标识之一），部分题目反向计分后，最终得出该量表项

目的平均分。父母中一位成员的婚姻满意程度得分越高，表明婚姻质量越佳。在本研究中，婚姻满意度问卷在父亲和母亲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01，0.910。

2.2.2 协同养育问卷

采用 Stright 和 Bales（2003）编制，Chen（2019）翻译的中文版《协同养育感知问卷》（Parents’ Perceptions of the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来评估父母协同养育，共有 14 个项目。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1”代表“从不”，“5”代表“始终如此”。该问卷最初只计算了一个的协同养育质量指标，通过反向编码不支持协同养育的项目后计算得出该量表项目的平均分，即父母中一位成员的协同养育的程度，得分越高，表明协同养育程度越佳。后续部分研究者（例如，Cook et al., 2009）将协同养育感知问卷分为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两个分量表进行测量。支持性协同养育分量表含有将 7 个项目，评估了父母配偶的支持性协同养育行为（例如，“当我教育孩子时，我的配偶会在背后支持我。”），量表项目的平均分代表支持性协同养育的程度，得分越高，表明支持性协同养育程度越佳；破坏性协同养育分量表含有 7 个项目，评估了父母配偶的破坏性协同养育行为（例如，“配偶会当着孩子的面指责我的教养方式。”），量表项目的平均分代表破坏性协同养育的程度，得分越高，表明破坏性协同养育程度越重。已有多项研究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支持性协同养育中文版分量表和破坏性协同养育中文版分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度（Chen, 2019; Fan & Chen, 2020）。在本研究中，支持性协同养育分量表在父亲和母亲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48，0.862，破坏性协同养育分量表在父亲和母亲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836，0.795。

2.2.3 教养能力感问卷

采用 Gibaud -Wallston 和 Wandersman（1978）编制，Chen 和 Xu（2018）翻译的中文版《教养能力感问卷》（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 PSOC），来评估父母对自己教养能力的自信程度，共有 17 个项目。该问卷分为教养满意度和教养效能感两个方面（Johnston & Mash, 1989）。教养满意度评估了对自己教养者角色的喜爱/满意程度，含有 9 个项目（例如，“成为一名家长让我感到紧张和焦虑”，需要反向计分）。教养效能感评估了对自己教养者角色能力的感知，含有 8 个项目（例如，“我愿意去做一个合适的榜样，让新父母们学习哪些东西是他们所要了解的，以便可以成为一个好的家长。”）。采用李克特 6 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6”代表“完全同意”。部分题目反向计分后，最终得出该量表项目的平均分。父母中一位成员的教养能力感得分越高，表明教养能力感越佳。近期研究表明，教养能力感中文版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Chen & Xu, 2018）。在本研究中，教养能力感问卷在父亲和母亲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77 和 0.763。

2.3 研究程序

基于研究目的的需要，本研究分为两次时间对家庭中的父亲和母亲进行调查。第一次时间（T1），向父亲、母亲发放《婚姻满意度问卷》721 组，父亲与母亲均分别作答，共 1442 份；一年后，第二次时间（T2）向同一批父亲、母亲发放《协同养育感知问卷》和《教养能力感问卷》，父亲与母亲如第一次时间程序均分别作答。数据收集为两段时间（时隔一年）的集中收集，两次收集可以保证均为同一批次被试的入户调查。数据回收后，研究人员对数据进行仔细筛选，将胡乱作答和大面积未作答的数据删除，最终，保留有效数据进行后续分析。

为防止父母数据的污染，本研究采用主试入户调查方式收集家庭信息。入户施测时，要求主试监督父母独立完成问卷，不做交流。填写完成后，问卷由研究者统一回收。调查结束后，主试提供纪念品作为报酬。

2.4 数据整理与分析

采用 SPSS23. 0 及 Mplus 7. 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参照 Wickham 和 Macia（2019）和 Volling 等人（2021）的分析方法，对于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模型进行分析。

其中，研究说明，标准化因子载荷的平方表示一个指标的方差被潜变量解释的比例，是对该指标可靠性的估计，可靠性越高，误差方差越小，此指标对潜变量的代表越佳（Ledermann & Kenny, 2012）。在两个指标的测量模型中，两个标准化因子载荷的乘积等于两个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若需要达到可靠的指标，两指标间的内相关度需要达到中等到高（Ledermann & Kenny, 2012）。当此相关性很弱时会出现严重的估计困难，同时也缺少证据说明存在共同的潜在变量。因此，在采用共同命运模型之前，研究者应该检查两个成员涉及的潜在变量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是否稳健，相关系数至少达到 0.20（Ledermann & Kenny, 2012）。本研究相关性判断标准设为了 0.50，符合两指标间的内相关度需要达到的中等以上，并且是在一定程度上比共同命运模型的传统限制更严格，形成在概念与实际中更直观以及更具有理论说服力的混合模型（包含个人层面和家庭/二元层面）进一步分析（Wickham & Macia, 2019）。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法在 T2 时间收集的父亲和母亲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为此采用单一潜因子控制法对父亲和母亲的作答数据（协同养育和教养能力感）分别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 龙立荣, 2004）。结果显示，父亲和母亲数据均有 7 个因子特征根大于 1，第一个因子对变异量仅能解释 23.71%（父亲）和 23.14%（母亲），均小于 40%的临界标准，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考察 T1、T2 婚姻质量、教养能力感、支持性与破坏性协同养育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表 2）：在 T1 时间内，父亲与母亲婚姻质量显著正相关；在 T2 时间内，父、母亲支持性协同养育与父、母亲教养能力感显著正相关，父、母亲破坏性协同养育与父、母亲教养能力感显著负相关，父、母亲支持性协同养育与父、母亲破坏性协同养育显著负相关。结合 T1，T2 时间，父、母亲婚姻质量 T1 与父、母亲支持性协同养育 T2 显著正相关，父、母亲婚姻质量 T1 与父、母亲破坏性协同养育 T2 显著负相关，父、母亲婚姻质量 T1 与父、母亲教养能力感 T2 显著正相关。

表 2 父、母婚姻质量、教养能力感、支持性与破坏性协同养育的相关分析

	1	2	3	4	5	6	7	8
1. 父亲婚姻质量 T1	-							
2. 母亲婚姻质量 T1	**0.71*** **	-						
3. 父亲支持性协同养育 T2	0.41***	0.32***	-					
4. 母亲支持性协同养育 T2	0.30***	0.41***	**0.61*** **	-				
5. 父亲破坏性协同养育 T2	-0.36***	-0.32***	-0.57***	-0.35***	-			
6. 母亲破坏性协同养育 T2	-0.33***	-0.41***	-0.40***	-0.59***	**0.57*** **	-		
7. 父亲教养能力感 T2	0.22***	0.25***	0.36***	0.31***	-0.37***	-0.26***	-	
8. 母亲教养能力感 T2	0.20***	0.31***	0.27***	0.36***	-0.22***	-0.37***	**0.45*** **	-
M	4.00	3.94	3.69	4.00	2.16	2.12	4.18	4.24
SD	0.69	0.70	0.61	0.62	0.64	0.60	0.58	0.59

注：*p < 0.05，**p < 0.01，*** p < 0.001。

其中，在 T1 时间内，父亲婚姻质量与母亲婚姻质量的相关值为 0.71；在 T2 时间内，父亲支持性协同养育与母亲支持性协同养育的相关值为 0.61，父亲破坏性协同养育与母亲破坏性协同养育的相关值为 0.57，父亲教养能力感与母亲教养能力感的相关值为 0.45。由此可知，父母婚姻质量、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的二元内（父母关系中）相关性均大于 0.50，并且相较于教养能力感（0.45）更高，这三个变量使用共同命运模型进行分析是更合适的。

3.3 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影响：基于共同命运模型

本研究分析了来自父母双方的报告形成的有关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影响的基本共同命运模型，共同命运变量中二元水平自变量为父母婚姻质量，二元水平因变量为父母报告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结果如图 4 所示。本研究假设基本共同命运模型拟合指标为：x^2/df = 1.60，RMSEA=0.03，SRMR=0.04，CFI=0.99，TLI=0.99，模型拟合良好（温忠麟 等, 2004）。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显著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γ=0.50, t=8.57, p<0.001），显著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γ=-0.53, t=-8.93, p<0.001），假设 1 成立。此外，父亲或母亲所报告感知的个人层面的婚姻质量方差估计（ε）对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的影响均不显著（ps>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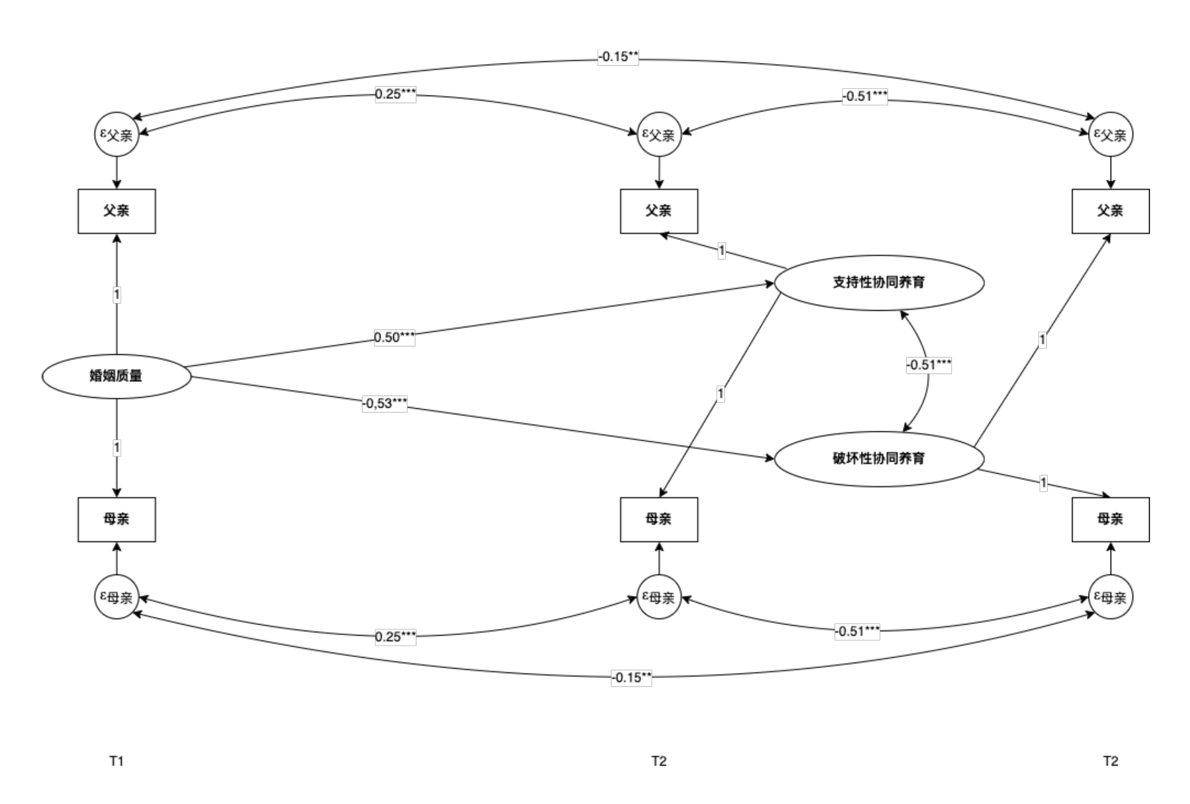


图 4 基于基本共同命运模型的假设模型结果

3.4 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影响：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分析

本研究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模型的二元水平自变量（父母婚姻质量）和个体水平的中介变量（父母教养能力感）来预测二元水平因变量（父母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父母破坏性协同养育），结果如图 5 所示。本研究假设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模型拟合指标为： x^2/df =2.49，RMSEA=0.05，SRMR=0.04，CFI=0.99，TLI=0.97，模型拟合良好（温忠麟 等，2004）。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显著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 γ=0.37， t=5.19， p<0.001），显著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 γ=-0.41， t=-6.22， p<0.001）。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显著正向预测父亲教养能力感（ γ=0.30， t=4.77， p<0.001）和母亲教养能力感（ γ=0.32， t=5.25， p<0.001），假设 2 成立。父亲教养能力感显著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 γ=0.24， t=3.87， p<0.001），显著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 γ=-0.23， t=-3.79， p<0.001）；母亲教养能力感显著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 γ=0.18， t=2.78， p<0.01），显著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 γ=-0.16， t=-2.56， p<0.05），假设 3 成立。此外，父亲或母亲所报告感知的个人层面的婚姻质量方差估计（ ε ）对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和父亲教养能力感的影响均不显著（ps>0.05）。但是，父亲和母亲所报告感知的个人层面的婚姻质量方差估计（ ε ）分别对母亲教养能力感的影响显著（ $\gamma_{父亲——婚姻质量}$=-0.20， $p_{父亲——婚姻质量}$<0.01； $\gamma_{母亲——婚姻质量}$=0.20， $p_{母亲——婚姻质量}$<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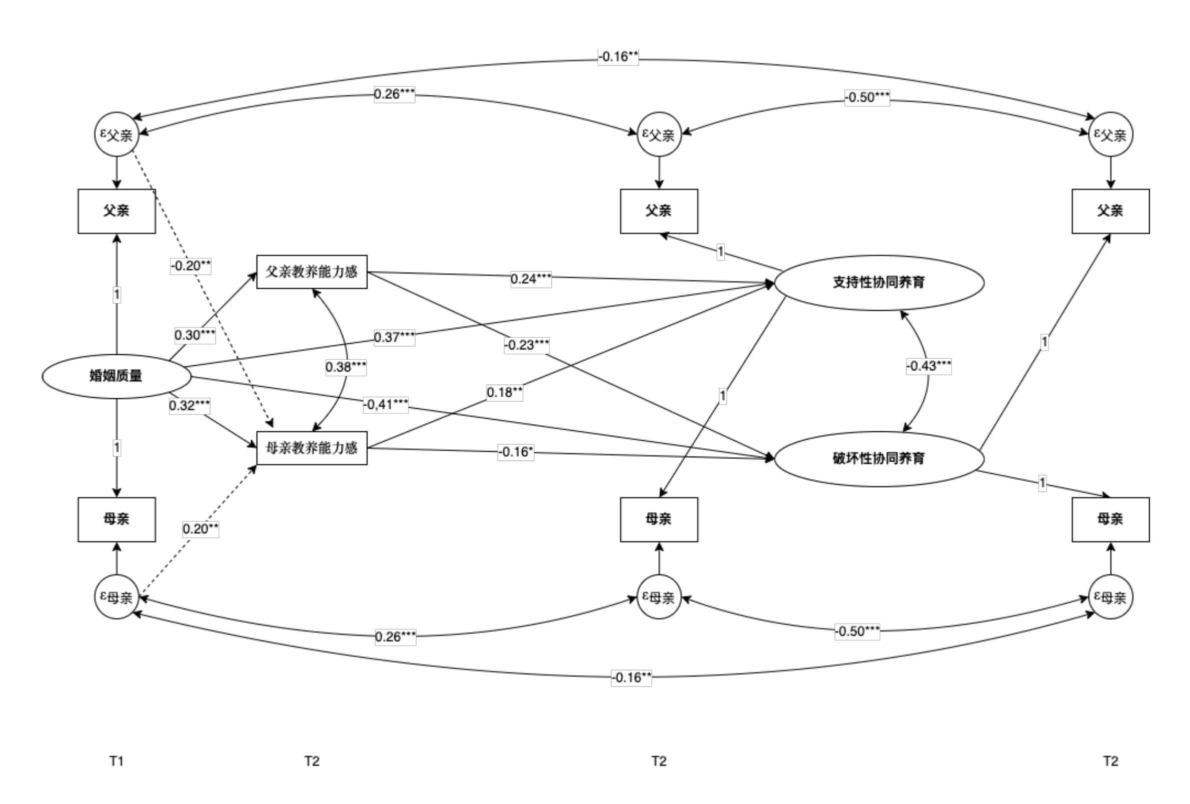


图 5 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假设模型结果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 Bootstrap（重复取样 3000 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及置信区间的估计，当其 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 0，则表明间接效应显著。结果显示，父亲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之间的中介效应为 0.07，其 95%的置信区间为 [0.03，0.12]，中介作用显著；母亲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之间的中介效应为 0.06，其 95%的置信区间为 [0.01，0.11]，中介作用显著。父亲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之间的中介效应为 -0.07，其 95%的置信区间为 [-0.12，-0.03]，中介作用显著；母亲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之间的中介效应为-0.05，其 95%的置信区间为 [-0.10，-0.01]，中介作用显著。由此可知，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通过父亲教养能力感和母亲教养能力感对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产生影响，其总中介效应为 0.13；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通过父亲教养能力感和母亲教养能力感对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产生影响，其总中介效应为-0.12。因此，父亲教养能力感和母亲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之间起跨层中介作用，假设 4 成立。

3.5 孩子性别和家中孩子数量对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之间关系的影响

3.5.1 孩子性别

本研究探讨了在共同命运模型下孩子性别是否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间产生影响，对婚姻质量对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的总体模型进行了等价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关系设置相等的约束模型和原始的无约束模型在群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Δ x^2=3.468，Δdf=2，Δ x^2/Δdf=1.734，p=0.177>0.05，并且 ΔCFI=0.002<0.01，ΔRMSEA=0.002<0.015，表明在家庭层

面的婚姻质量对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的关系上不存在跨孩子性别群组的差异。同时，本研究探讨了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模型下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孩子性别群组差异，对其进行了等价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关系设置相等的约束模型和原始的无约束模型在群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Δx^2=4.179，Δdf=8，$\Delta x^2/\Delta df$=0.522，p=0.841>0.05，并且 ΔCFI=0.003<0.01，ΔRMSEA=0.008<0.015，表明父母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间的中介效应具有跨性别的一致性。

3.5.2 家中孩子数量

本研究探讨了在共同命运模型下家中孩子数量是否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影响中产生影响，对婚姻质量对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的总体模型进行了等价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关系设置相等的约束模型和原始的无约束模型在群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Δx^2=2.289，Δdf=2，$\Delta x^2/\Delta df$ =1.145，p=0.318>0.05，并且 ΔCFI=0.001<0.01，ΔRMSEA=0.001<0.015，表明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对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的关系上不存在家中孩子数量带来的差异。同时，本研究探讨了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模型下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家中孩子数量群组差异，对其进行了等价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所有关系设置相等的约束模型和原始的无约束模型在群组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Δx^2=10.745，Δdf=8，$\Delta x^2/\Delta df$=1.343，p=0.217>0.05，并且 ΔCFI=0.002<0.01，ΔRMSEA=0.003<0.015，表明父母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间的中介效应不存在家中孩子数量带来的差异。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了追踪设计和在家庭或二元层面研究中值得信赖的模型——共同命运模型，探讨了正常拥有孩子家庭中，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对家庭层面的协同养育程度的影响，以及父母各自教养能力感在两者间的跨层中介作用。研究表明：良好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正向预测父母支持性协同养育，并负向预测父母破坏性协同养育；良好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正向预测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正向预测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并负向预测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起中介作用。并且，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对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的关系中以及父母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支持性协同养育和破坏性协同养育间的中介效应中，均不存在孩子性别和家中孩子数量带来的差异。

相较于以往研究，过去从个体层面探讨家庭层面的问题是不适宜的，至少在统计上是存在问题的，其忽视了家庭成员内部的相互作用，研究结果其实是片面的。本研究的贡献之处在于运用高级的研究方式，也就是共同命运模型，更加正确地去分析家庭问题。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通过家庭层面良好的婚姻质量和父母个体层面教养能力感的理解认知，探寻了对家庭整体的协同教养的影响机制，侧面助力孩子在家庭中的健康成长。从理论意义上，本研究基于家庭层面的理论基础，为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依据，并进一步促进了共同命运模型的发展。从实践意义上，本研究从家庭层面与个人层面共同思考，帮助有孩子

的家庭成员通过维护良好的婚姻关系，提升自身的教养认知，以及促进父母间的协同养育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4.1 家庭整体婚姻质量影响父母协同养育

在家庭环境中，婚姻质量会影响父母积极与消极情感的表达（梁宗保 等，2013），并可能表现在对孩子的态度与养育上，影响亲子关系与亲子互动（刘斯漫 等，2018）。本研究结果表明，婚姻质量影响父母协同养育行为，与已有研究一致（Mangelsdorf et al.，2011；刘畅 等，2016），良好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会促进父母支持性协同养育行为，减少父母破坏性协同养育。对于婚姻质量，夫妻双方婚姻经营时的理念与行为是否一致或是否产生冲突，均受到夫妻双方的影响。当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的价值观念一致时，夫妻双方会朝着符合价值观念的方向努力，家庭整体的婚姻质量易呈现良性，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情感与行为联结更加紧密。在孩子的养育上，父母双方更易友好合作，遇见问题共同理智分析和解决，形成良好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当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时，家庭整体的婚姻质量易发生动摇，进而影响家庭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情感交流与行为和谐。在孩子的养育上，父母双方可能更多关注自己婚姻问题，影响养育孩子的主动性与投入程度，缺乏齐心协力，甚至产生控制与敌意，导致破坏性协同养育。

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婚姻质量不高，婚姻冲突较多的家庭中，父母婚姻质量会影响他们教养孩子目标的一致性，教养规范与策略上的统一性，导致孩子不知所措（马梅芬 等，2017）。并且，父母容易将婚姻中未处理完的敌意与矛盾蔓延到对孩子的教育中，更容易对孩子严厉教养，忽略对孩子的身心进行关爱，导致孩子产生不安全依恋，从而产生问题行为（池丽萍， 王耘， 2002）。并且，研究表明，父母较低的婚姻质量会影响孩子的内化行为，包括焦虑、抑郁、退缩等（何筱荷， 侯金芹， 郭菲， 陈祉妍， 2021），对孩子身心发展、学业成就、人际交往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Yap & Jorm， 2015）。

父母支持性协同养育易在增加双方沟通与共同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增强孩子安全感，减少孩子问题行为；父母破坏性协同养育易在双方关系紧张与敌对行为滋生的过程中，导致孩子情绪调节异常、社会适应不良，让孩子产生极大压力，激发其焦虑与抑郁等问题（刘丹丹， 2018）。父母良好地协同养育配合有利于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情感氛围，增强家庭成员凝聚力，以此共同应对孩子出现的各种问题，降低孩子问题发生风险（卢富荣 等，2019）。因此，对于婚姻或养育出现问题的家庭教育临床干预尤为重要。在这类干预中，咨询师需要关注夫妻关系的变化，增加夫妻之间良性互动的引导，并及时强调夫妻双方婚姻经营对孩子养育的影响，注重婚姻与家庭教育。通过父母双方理性沟通与积极卷入，父母共同调整育儿行为，避免家庭关系的恶化。

4.2 父母教养能力感在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基于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通过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间接影响家庭层面的协同养育，婚姻质量越高，父母各自的教养能力感越高，进而父母的支持性协同养育程度越高，破坏性协同养育程度越低。父母双方在婚姻关系中感受到自己是被爱时，其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会更愿意展开自我觉察，并在行为上给予相互支持，提升相应能力。也就是说，当家庭中父母婚姻质量良好时，双方在解决养育孩子的不一致问题中能够更好地对自己教养方面的能力进行感知与调整，会尝试以倾听、幽默等积极行为方式回应与支持对方，并尽可能避免指责、干涉、惩罚等控制性行为（Kwon & Elicker，

2012)，进而整个家庭富有安全感，也便于孩子健康成长。此外，研究表明，除家庭整体婚姻质量的影响，父亲和母亲在婚姻关系上个体层面的感受还会对母亲的教养能力感产生影响，其可能是家庭中母亲这个独特身份所决定的，使母亲在养育的过程中更加敏感。

虽然从数据结果分析，本研究父亲教养能力感和母亲教养能力感的中介效应较低，但是其中介效应仍然是显著的，说明这些路径中所带来的作用同样不容小觑。已有研究表明，产生占总效应较小的中介效应是可理解并且有意义的（叶宝娟 等，2017），会由以下因素造成。首先，在社会科学中即使是小的效应量，在理论意义中也可能发挥重要效果。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是预测机制间存在的因素是否产生影响，而忽略考虑因素在影响机制下的绝对大小作用，得到验证理论支持的小效应也应该具备重要价值（Gall et al., 2007）。其次，在实践中，小效果量在一定程度下会产生重大影响（Ellis, 2010），方法专家表示，当较多人群适应小效应的结果，或者小效应可能随着时间的历程逐渐累积为大效应，或者小效应会直接或间接引发严重影响时，即使效应小也值得研究者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叶宝娟 等，2017）。虽然本研究父母教养能力感中介效应相对偏小，但当父母拥有较少教养能力感时依旧可能对孩子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即父母较少教养能力感的长期状态可能累积成大效应，因此，这种相对偏小的中介效应成立并且应该重视。

从教养能力感作为中介变量的研究分析发现，在国外，许多育儿计划重点关注于父母养育孩子的方式，而很少关注父母认知所带来的影响，但是教养能力感是积极育儿的核心（Dekovic et al., 2010）。虽然探寻教养能力感中介效应的研究较少，但是也有纵向研究发现婚姻压力和父母教养能力感之间存在互惠关系（van Eldik et al., 2017）。在国内，教养能力感中介效应的研究偏向将父母教养能力感分为教养满意度与教养效能感两部分以探寻其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其存在的中介效应均较低（张晓 等，2017；邢凯 等，2019；柴彩霞 等，2020）。教养能力感中介效应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相较于教养行为，教养能力感属于描述个人教养孩子时身份能力的感知，难以意识，并需要进行个人评估（Johnston & Mash, 1989）。并且，教养能力感是在父母对儿童教养过程中产生的，其中介效应可能不明显。但是，在认知层面教养能力感引起的变化是会影响养育子女的成长，有效的教养行为与教养能力感相辅相成（张晓 等，2017），需要加以重视。Ohan 等人（2000）认为家庭生活中受父母控制或者父母影响下的变量可能与教养能力感联结更强。因此，本研究探寻父母共同影响下的婚姻质量与协同养育行为可以进一步凸显教养能力感带来的影响。

本研究关注教养能力感中介效应的价值在于父母教养能力感与教养能力和子女发展紧密相关（Jones & Prinz, 2005），有助于帮助父母不断地接受挑战和调动资源以实现育儿目标（Bandura, 1997）。缺乏教养能力感的父母不仅表现出缺乏足够的教养能力，而且他们也会倾向于退出与孩子的互动，并放弃解决孩子的问题行为（Coleman & Karraker, 1998）。并且，教养能力感已被证实为一重要的保护因素，它可以缓冲不利家庭环境的消极影响（Jones & Prinz, 2005）。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关注针对父母教养能力感的干预。研究表明，父母教养能力感对教养行为有积极正向预测作用，同时它也可作为教养干预效果的有效指标（Dekovic et al., 2010; Turner et al., 2011）。由此，在家庭教育干预中，咨询师可以帮助家庭中协同教养能力不佳的父母从婚姻关系是否存在危机与自我教养能力不足中进行反思，提升父母养育的自我效能感与满意度，并引导

夫妻双方肯定对方在育儿中的积极行为，使父母双方更愿意在共同教养孩子过程中相互疏导、给予支持，也以此帮助提高夫妻婚姻质量与彼此的教养能力感，促进提升家庭亲密度与家庭适应性，维护家庭稳定发展，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总之，在家庭系统中，父母改善与亲子子系统有关的父母协同养育可以从婚姻子系统出发（Cox, 2010）。父母提高婚姻质量，增进夫妻间的情感交流，及时处理和疏导婚姻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可以尽量避免将婚姻的不满带入日常的养育行为中（何筱荷，侯金芹，陈祉妍，2021），并且，父母可以将更多地精力放在对自我教养能力的反思与提升上，积极地与对方沟通共同养育孩子的方式与实践。

4.3 共同命运模型在家庭研究中的应用

已有研究在个人层面表明，父亲的婚姻满意度稳定地预测了父亲的协同养育行为、母亲的婚姻满意度也同样对母亲的协同养育行为具有稳定的预测效应（陈玲玲 等, 2014）。同时，根据交叉假说，即父母中的一方在夫妻子系统中的感受或行为会影响另一方在家庭中其他子系统中的感受与行为（White, 1999），可以知晓双方存在相互影响与依赖。从家庭层面来看，婚姻质量是夫妻双方相互影响而形成的，父母感知的整体婚姻质量具有相互依赖性。在家庭父母双方抚养孩子中，父母双方均需较大的养育投入，协同养育是双方与家庭环境共同构建的结果（Sarah et al., 2016）。父母协同养育在家庭中相互影响，共同调节着家庭互动（Minuchin, 1974）。因此，有必要使用共同命运模型在家庭层面去探寻相互影响的双方相似的（共享的）或不同的（独特的）的感受与行为——家庭婚姻质量与家庭层面的父母协同养育，使家庭与亲密关系间的研究更加缜密（Ledermann & Kenny, 2012）。本研究基于共同命运模型对其进行了整体分析，其中将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作为共同命运变量。研究表明，良好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促进家庭层面的支持性协同养育，减少家庭层面的破坏性协同养育，并验证了共同命运模型在家庭层面研究中的应用具有一定合理性，启示研究者使用父母双方的数据在家庭层面进行研究探讨。

同时，本家庭研究考虑到教养能力感在家庭互动中尤为重要，并且其在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中的影响机制未有探明。基于文献支持，本研究拓展了基本共同命运模型，考虑父母各自教养能力感在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与协同养育间的中介效应。但是，人格特质存在相对稳定性，相较于感知到的婚姻质量与具有行为示范性的协同养育，父母双方各自的教养能力感更由个体自身因素所决定。教养能力感属于个人层面变量，不属于家庭层面变量（共同命运变量），由此，本研究探索了共同命运模型的跨层中介分析。

与此同时，纵向研究设计可以潜在地提供因果推断的依据，更清楚地了解婚姻质量对父母协同养育的预测作用，而不是只有统计上的关联（Brown et al., 2017）。相关分析在不同时间点内进行分析可以探寻跨时间下各变量间是否具有关联。最重要的是，基于跨时间的中介模型建立后的研究结果，可以将时间和家庭环境的变化加入到对中介模型的理解中，探寻其产生的长期影响机制。本研究则是揭示了父母婚姻质量对其协同养育行为随时间变化的影响“过程”机制，其中教养能力感为重要的影响途径。并且，本研究还在纵向共同命运中介模型下探寻了父母各自教养能力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家庭婚姻质量与父母协同养育之间的中介作用，使时间和家庭环境的变化影响考虑更加全面。

此外，在共同命运模型下，本研究家庭层面的婚姻质量对协同养育的影响未发现因孩子性别或家中孩子数量所带来的不同。这可能与研究家庭中孩子年龄段

有关。本研究家庭中父母的孩子年龄聚焦于学前时期，此时男孩女孩对父母关系和兄弟姐妹的敏感性可能还未展现。与此同时，本研究的父母均为处于正常婚姻关系中，而非异常的婚姻关系（如离异、分居、重组等），未给孩子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性别可能带来的敏感性也未出现（梁宗保 等, 2013）。而家中的数量不影响本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说明，家庭层面的父母婚姻质量以及协同养育对独生子女家庭、两孩和多孩家庭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Chen et al., 2021; Chen & Zhou, 2019），我们的研究为进一步分析家庭层面父母关系对同胞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和研究方向。

本研究是共同命运模型在中国家庭研究中的初次应用，是一次有益的探索，愿研究者未来在共同命运模型的基础上深入本土化探索。

4.4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根据我国国情可知，我国家庭养育孩子中存在祖辈-父辈共同养育的模式，该模式以祖辈主要照顾家中孩子的日常生活为主，父辈在工作之余负责幼儿的教育与休闲，祖父辈各司其责，共同养育幼儿（郭媛芳, 李晓巍, 2021），因此，本研究未来可以基于共同命运模型对此类家庭的协同养育情况进行深入探讨。同时，协同教养研究应该最终落脚于孩子的发展，可进一步延伸其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影响，并且将我们的理论模型所强调的家庭互动机制作用延伸到儿童个体层面的具体发展。另外随着三孩政策开放，我们甚至可以探讨二元甚至三元的同胞关系是如何收到父母二元关系的影响。这些都将称为未来研究的方向，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意义。此外，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1）对于婚姻质量还涉及的不同侧面，例如夫妻角色平等、夫妻沟通等（Fourmier & Olson, 1983），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婚姻中各方面对家庭所带来的影响；（2）研究家庭中的孩子年龄尚幼，均处于学龄前期，研究结果推论到其他家庭中有待思量；（3）参与本研究的父母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均较高，有待探寻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是否产生不同结果；（4）追踪研究只包含两轮数据，未来可以更加完善以充分验证相关结论。

参 考 文 献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2), 191 - 215.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W.H. Freeman and Company.

Belsky, J., Woodworth, S., & Crnic, K. (1996). Trouble in the second year: Three questions about family interaction. *Child Development, 67*, 556 - 578.

Bronfenbrenner, U. (1988). *Interacting systems in human development: Research paradigms: Present and future*. In N. Bolger, A. Caspi, G. Downey, & M. Moorehouse (Eds.), Persons in context: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pp. 25 - 49).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C.C., Carroll, J.S., Yorgason, J.B., Busby, D.M., Willoughby, B.J., & Larson, J.H. (2017). A common-fate analysis of pornography acceptance, use, and sexual satisfaction among heterosexual married couple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6*(2), 1 - 10.

Cabrera, N.J., Scott, M., Fagan, J., Steward-Streng, N., & Chien, N. (2012). Coparenting and children’s school readiness: A mediational model. *Family Process, 51*(3), 307 - 324.

Chai, C.X., Feng, X.Z., Liu, L.P., & Chen, H.X. (2020). Effect of parenting expectation on parenting stress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parents: A mediating effect of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8*(10), 1514 - 1518.

[柴彩霞, 冯喜珍, 刘丽萍, 陈红香. (2020). 小学生父母的期望与教养压力的关系: 父母教养能力感的中介效应.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8*(10), 1514 - 1518.]

Chang, L., Lansford, J.E., Schwartz, D., & Farver, J.M. (2004). Marital quality, maternal depressed affect, harsh parenting, and child externalising in Hong Kong Chinese famil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8*(4), 311 - 318.

Chen, B. B. (2019). Chinese adolescents' sibling conflicts: Links with maternal involvement in sibling relationships and coparenting.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9*(3), 752 - 762.

Chen, B.-B. (20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mothers' parenting stress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maternal warmth and co-parenting.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90*, 1350-1358.

Chen, B.-B., Qu, Y., & Chen, X. (2021). Chinese parents' comparisons of siblings and adolescents'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33,* 914 - 921.

Chen, B. B., & Xu, Y. (2018). Mother's attachment history and antenatal attachment to the second bab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ing efficacy in raising the firstborn child. *Archives of Women's Mental Health, 21*, 403 - 409.

Chen, B.-B., Shen, M., Jin, S., & French, D. C. (in press). Chinese adolescents'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The effects of the gender of their younger sibling. *PsyCh Journal.*

Chen, B.B., & Shi, Z. Y. (2017). Parenting in families with two children.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7), 1172 - 1181.

[陈斌斌, 施泽艺. (2017). 二胎家庭的父母养育. *心理科学进展, 25*(7), 1172 - 1181.]

Chen, B.B., Wang, Y., Liang, J., & Tong, L. (2016). And baby makes four: 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firstborn's adjustment to transition to siblinghood.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6), 863 - 873.

[陈斌斌, 王燕, 梁霁, 童连. (2016). 二胎进行时: 头胎儿童在向同胞关系过渡时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心理科学进展, 24*(6), 863 - 873.]

Chen, B.-B., & Zhou, N. (2019). The weight status of only children in China: The role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maternal warmth.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8,* 2754 - 2761.

Chen, L.L., Wu, X.C., & Liu C.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father involvement: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oparenting.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0*(3), 268 - 276.

[陈玲玲, 伍新春, 刘畅. (2014). 父母的婚姻满意度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 父母协同教养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0*(3), 268 - 276.]

Chen, Y., Yang, K. D., Lan, J., Li, X. M., & Fang, X. Y. (2020). Short-term and long-term effects of Newlywed couples' neuroticism on marital stability: Mediating effect of marital quality.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8*(2), 5 - 10+41.

[陈媛, 杨凯迪, 兰菁, 李晓敏, 方晓义. (2020). 新婚夫妻神经质对婚姻稳定性的即时与长时效应: 婚姻质量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8*(2), 5 - 10+41.]

Chi, L. P., & Wang, Y. (2002). Theoretical advance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rital conflict and problem behaviors in children.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0*(4), 411 - 417.

[池丽萍, 王耘. (2002). 婚姻冲突与儿童问题行为关系研究的理论进展. *心理科学进展, 10*(4), 411 - 417.]

Christina, R., Studts, Meagan, R., & Pilar, et al. (2019). Fatigue and physical activity: Potential modifiable contributors to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8*(10), 2901 - 2909.

Coleman, P. K., & Karraker, K. H. (1998). Self-efficacy and parenting quality: Findings and future applications. *Developmental Review, 18*(1), 47 - 85.

Cook, J. C., Schoppe-Sullivan, S. J., Buckley, C. K., & Davis, E. F. (2009). Are some children harder to coparent than others? Children' s negative emotionality and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3*(4), 606 - 610.

Cox, M. J. (2010). Family systems and sibling relationships.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4*(2), 95 - 96.

Cox, M. J., & Paley, B. (1997). Families as system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8*, 243 - 267.

Cox, M. J., & Paley, B. (2003). Understanding families as system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193 - 196.

Davies, P.T., Sturge-Apple, M.L., & Cummings, E.M. (2004). Interdependencies among interparental discord and parenting practices: The role of adult vulnerability and relationship perturbation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6*(3), 773 - 797.

Dekovic, M., Asscher, J. J., Hermanns, J. M. A., Reitz, E., Prinzie, P., & van den Akker, A. L. (2010). Tracing changes in families who participated in home-Start parenting program: Parental competence as mechanism of change. *Prevention Science, 11*, 263 - 274.

Ellis, P. D. (2010). *The essential guide to effect sizes: Statistical power, meta-analysi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rel, O., & Burman, B. (1995). Interrelatedness of marital relation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8*(1), 108 - 132.

Fan, J., & Chen, B. B. (2020). Parenting styles and coparenting in china: The role of parents and children's sibling status. *Current Psychology, 39*(5), 1505 - 1512.

Feinberg, M. E. (2003).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context of coparenting: A framework for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Parenting, 3*(2), 95 - 131.

Fourmier, D.G., & Olson, D.H. (1983). Assessing marital and premarital relationships: The PREPARE-ENRICH inventories. In Filsinger, Erike (Eds). Marriage and family assessment: A sourcebook for family therapy. (pp. 229 - 250). Sage Publications.

Fowers, B. J., & Olson, D. H. (1993). ENRICH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A brief research and clinical too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7*(2), 176 - 185.

Frank, S., Jacobson, S, & Hole, C. B. (1986).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parents' sense of confidence and control and self-versus child-focused gratificat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2*(3), 348 - 355.

Gall, M. D., Gall, J. P., & Borg, W. R. (2007). *Educational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8th ed.).* Boston, MA: Pearson.

Galovan, A. M., Holmes, E. K., & Proulx, C. M. (2017).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relationship research: Considering the common fate model. *Journal of Social &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4*(1), 44 - 68.

Gibaud-Wattston, I., & Wandersman, L. P. (1978, August). *Development and utility of the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oronto.

Gottman, J. M. (1993a). A theory of marital dissolution and stability.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7*, 57 - 75.

Gottman, J. M. (1993b). The roles of conflict engagement, escalation, and avoidance in marital interaction: A longitudinal view of five types of coupl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1(1), 6 - 15.

Gottman, J.M., & Notarius, C.I. (2002). Marital research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a research agenda for the 21st century. *Family Process, 41*(2),159 - 197.

Guo, Y. F., & Li, X. W. (2021). Interaction between grandparent-parent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and young children's tempera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9*(4),783 - 788.

[郭媛芳, 李晓巍. (2021). 祖辈 - 父辈共同养育关系与幼儿气质的相互作用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4),783 - 788.]

He, X. H., Hou, J. Q., & Chen, Z. Y. (2021). A longitudin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parents' marital quality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homework efforts: The mediation of parent-child cohesion.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9*(1), 45 - 51.

[何筱荷, 侯金芹, 陈祉妍. (2021). 父母婚姻质量对小学生家庭作业努力影响的追踪研究: 亲子亲合的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9*(1), 45 - 51.]

He, X. H., Hou, J. Q., Gou, F., & Chen, Z. Y. (2021). The impact of parents' marital quality on the internalizing problems of elementary students: An analysis of chained medi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9*(2), 287 - 291.

[何筱荷, 侯金芹, 郭菲, 陈祉妍. (2021). 父母婚姻质量对小学生内化问题的影响: 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2), 287 - 291.]

Ihinger-Tallman, M., Pasley, K., & Beuhler, C. (1995). *Developing a middle-range theory of father involvement postdivorce.* In W. Marsiglio (Ed.), Fatherhood: Contemporary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Research on men and masculinities series, 7 (pp. 57 - 77). Thousand Oaks, CA: Sage.

Johnston, C., & Mash, E. J. (1989). A measure of parenting satisfaction and efficacy.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18*(2), 167 - 175.

Jones, T. L., & Prinz, R. J. (2005). Potential roles of parental self-efficacy in parent and child adjustment: A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5*(3), 341 - 363.

Ju, X. Y., Li, X. M., Lan, J. & Fang, X. Y. (2020).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bserved interaction profile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mong husbands and wife: Implication to marital intervention after COVID-19 epidemic.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3*(4), 977 - 983.

[琚晓燕, 李晓敏, 兰菁, 方晓义. (2020). 夫妻互动类型异同及其与婚姻质量的关系——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婚姻干预的启示. *心理科学, 43*(4), 977 - 983.]

Kenny, D. A. (1996). Models of non-independence in dyadic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3*, 279 - 294.

Kenny, D. A., & La Voie, L. (1984). *The social relations model.* In L.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8, pp. 142 - 182).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Kenny, D. A., & Ledermann, T. (2010). Detecting, measuring, and testing dyadic patterns in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4*, 359 - 366.

Kwan, R. W., Kwok, S. Y., & Ling, C. C. (2015).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parenting self-efficacy and co-parenting alliance on marital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fathers and mother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 3506 - 3515.

Kwok, S. Y., Ling, C. C., Leung, C. L., & Li, J. C. (2013). Fathering self-efficacy,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father involvement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2*, 1051 - 1060.

Kwon, K. A., & Elicker, J. G. (2012). The role of mothers' and fathers' parental control and coparenting in toddlers' compliance. *Early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23*(5), 748 - 765.

Ledermann, T., & Kenny, D. A. (2012). The common fate model for dyadic data: Variations of a theoretically important but underutilized model.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6*(1), 140 - 148.

Li, X., O' Connor, S., Kivlighan, D. M., Jr., & Hill, C. E. (2020). "Where is the relationship" revisited: Using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ing and common fate model in examining dyadic working alliance and session qualit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68*(2), 194 - 207.

Liang, Z. B., Zhang, G. Z., Deng, H. H., Song, Y., Zhen, W. M., & Sun, L. (2013). Links between marital relationship and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 Mediating effects of parents'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5*(12), 1355 - 1367.

[梁宗保, 张光珍, 邓慧华, 宋媛, 郑文明, 孙铃. (2013). 从婚姻关系到亲子关系: 父母情绪表达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报, 45*(12), 1355 - 1367.]

Liu, C., & Wu, X. C. (2015). Co-parenting: History, structure and assessment.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3*(1), 32 - 37.

[刘畅, 伍新春. (2015). 协同养育的研究缘起、结构与评估.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3*(1), 32 - 37.]

Liu, C., Wu, X. C., & Zou S. Q. (2016). Effect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its similarity on coparenting in family with adolescenc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2*(1), 49 - 55.

[刘畅, 伍新春, 邹盛奇. (2016). 父母婚姻满意度及其相似性对协同养育的影响: 基于成对数据的分析. *心理发展与教育, 32*(1), 49 - 55.]

Liu, D.D. (2018).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marital quality, co-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Master Dissertation). Shanxi University.

[刘丹丹. (2018). *父母婚姻质量, 协同教养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大学.]

Liu, S. M., Wang, Z. Y., Zhang, Y., Jiang, Q., & Zhang, Q. (2018). Preoccupied/Unresolved attachment representations and control behaviors among mothers of toddlers: Moderating effects of marital quality and child gender.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41*(3), 565 - 571.

[刘斯漫, 王争艳, 张莹, 江群, 张茜. (2018). 学步儿母亲过度投入/未解决的依恋表征与控制行为: 婚姻质量及儿童性别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41*(3), 565 - 571.]

Lu, F. R., Zhang, C., & Liu, D. D. (2019). The effect of parental marital quality and coparenting on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Simultaneously spillover or lagged spillover?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5*(6), 740 - 748.

[卢富荣, 张彩, 刘丹丹. (2019). 父母婚姻质量、协同养育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 同时或者滞后溢出? *心理发展与教育, 35*(6), 740 - 748.]

Ma, M. F., Zhu, L., Yang, X. J., & Wang, Z. H. (2017). The effect of parents' marital conflict on junior students' academic burnout: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arenting.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3*(1), 21 - 29.

[马梅芬, 朱蕾, 杨小钧, 王振宏. (2017). 父母婚姻冲突与初中生学业倦怠的关系: 共同教养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1), 21 - 29.]

Mangelsdorf, S. C., Laxman, D. J., & Jessee, A. (2011). *Coparenting in two-parent nuclear families.* In J. P. McHale & K. M. Lindahl (Eds.), Coparenting: A conceptual and clinical examination of family systems (pp.39 - 59).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Margolin, G., Oliver, P. H., Gordis, E. B., O'Hearn, H. G., Medina, A. M., & Morland, G. L. (1998). The nuts and bolts of behavioral observation of marital and family interaction. *Clinical Child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view, 1*, 195 - 213.

McHale, J. P. (1995). Coparenting and triadic interactions during infancy: The roles of marital distress and child gender.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1*(6), 985 - 996.

McHale, J. P., Kuersten, R., & Lauretti, A. (1996).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amily-level dynamics during infancy and early childhood.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Development,* (74), 5 - 26.

Merrifield, K. A., & Gamble, W. C. (2013). Associations among marital qualities, supportive and undermining coparenting, and parenting selfefficacy testing spillover and stress-buffering process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4*, 510 - 533.

Minuchin, S. (1974). *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 Oxfo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han, J. L., Leung, D. W., & Johnston, C. (2000). The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 Evidence of a stable factor structure and validity.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32*(4), 251 - 261.

Pedro, M.F., Ribeiro, T., & Shelton, K.H. (2012).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partners' parenting practic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aren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6*(4), 509 - 522.

Preotu, I. D., & Turliuc, M. N. (2013). The common fate mediation model: Does communication of ideal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al similarity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alele Ştiinţifice ale Universităţii „Alexandru Ioan Cuza" din Iaşi (serie nouă) Psihologie, 22*(1), 103 - 118.

Riina, E.M. (2011). *Ecological and family systems perspectives on coparenting during adolescence.*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Riina, E.M., & McHale, S.M. (2014). Bidirectional influences between dimensions of co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adjustment.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43*(2), 257 - 269.

Sarah, J., Schoppe-Sullivan, Theresa, Settle, & Jin-Kyung, et al. (2016). Supportive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s as a haven of psychological safety at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13*(1), 32 - 48.

Schoppe-Sullivan, S. J., Mangelsdorf, S. C., Frosch, C. A., & McHale, J. L. (2004). Associations between coparenting and marital behavior from infancy to the preschool year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8*, 194 - 207.

Schumm, W. R., Paff-Bergen, L. A., Hatch, R. C., Obiorath, F. C., & Bugaighis, M. A. (1986). Concurr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the kansas marital satisfaction scal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8*(2), 381 - 387.

Solmeyer, A. R., & Feinberg, M. E. (2011). Mother and father adjustment during early parenthood: The roles of infant temperament and coparent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34*(4), 504 - 514.

Stright, A. D., & Bales, S. S. (2003). Coparenting quality: Contributions of child and parent characteristics. *Family Relations, 52*(3), 232 - 240.

Suzuki, S. (2010). The effects of marital support, social network support, and parenting stress on parenting: Self-efficacy among mothers of young children in Japan.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8*, 40 - 66.

Teubert, D., & Pinquart, M. (2011). The coparenting inventory for parents and adolescents (CI-PA).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7*(3), 206 - 215.

Turner, K. M. T., Nicholson, J. M., & Sanders, M. R. (2011). The role of practitioner self-efficacy, training, program, and workplace factor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evidence-based parenting intervention in primary care. *The Journal of Primary Prevention, 32*(2), 95 - 112.

van Eldik, W. M., Prinzie, P., Deković, M., & de Haan, A. D. (2017).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marital stress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Does parental sense of competence mediate process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1*, 420 - 430.

Volling, B. L., Lin, T., Gonzalez, R., & Bader, L. R. (2021). Coming together or falling apart: Coparenting the first child while expecting the second, Chapter 10.

Wang S. Q., Zhao B. X., Wu H., & Liu W. (2022). The Effects of Marital Quality on Children’s Pro-social Behavior: The Chain Mediating Model of Parental Positive Emotion Expression, Parenting Behavior and the Gender Differenc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8*(3), 323 - 330.

[王斯麒, 赵彬璇, 吴红, 刘伟. (2022). 婚姻质量对儿童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父母积极情绪表达和教养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及其性别差异. *心理发展与教育, 38*(3), 323 - 330.]

Wang, X. D., Wang, X. L., & Ma, H. (1999). Rating Scales for Mental Health (updated edition, pp. 153 - 159). Beijing, China: China Mental Health Journal.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1999).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pp. 153 - 159).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Wen, Z. L., Hau, Kit-Tai, & Herbert W.M. (2004).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esting: Cutoff criteria for goodness of fit indices and chi-square test.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6*(2), 186 - 194.

[温忠麟, 侯杰泰, 马什赫伯特. (2004).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 *心理学报, 36*(2), 186 - 194.]

White, L. (1999). Contagion in family affection: Mothers, fathers, and young adult childre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1*(2), 284 - 294.

Wickham, R. E., & Macia, K. S. (2019). Examining cross-level effects in dyadic analysi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erspective.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51*, 2629 - 2645.

Xing, K., Yang, S., & Chen, Y.W. (20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husband involvement: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7*(5), 1012 - 1015+1011.

[邢凯, 杨莎, 陈毅文. (2019). 婚姻满意度对丈夫教养投入的影响: 教养能力感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5), 1012 - 1015+1011.]

Xinhua News Network. (2021). Authoritative Express: The three-childbirth policy is coming.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5/31/c_1127513067.htm

[新华网. (2021). 权威快报: 三孩生育政策来了.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5/31/c_1127513067.htm]

Yang, X.J., Guo, F., & Chen, Z.Y. (2021).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father involvement: The mediating role of positive expressivenes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ing stress.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9*(2), 272 - 276.

[杨晓静, 郭菲, 陈祉妍. (2021). 婚姻满意度对父亲教养投入的影响: 积极情绪表达的中介作用及教养压力的调节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9*(2), 272 - 276.]

Yap, M. B., & Jorm, A. F. (2015). Parent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hildhood anxiety, depression,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75*(1), 424 - 440.

Ye, B.J., Fang, X.T., Yang, Q., Zhen, Q., Liu L.L., & Guo, S.Y. (2017). The effects of difficulties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on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facial negative physical self and 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3*(2), 249 - 256.

[叶宝娟, 方小婷, 杨强, 郑清, 刘林林, 郭少阳. (2017). 情绪调节困难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影响: 相貌负面身体自我和社交回避与苦恼的链式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3*(2), 249 - 256.]

Zayas, V., Shoda, Y., & Ayduk, O.N. (2002). Personality in context: An interpersonal system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0*(6), 851 - 900.

Zhang, X., Li, L.F., Bai, L., & Chen, Y.H.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quality and adolescents' prosocial and problem behavior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parents' parenting competence.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5*(2), 240 - 249.

[张晓, 李龙凤, 白柳, 陈英和. (2017). 父母婚姻质量对青少年行为的影响: 父母教养能力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5*(2), 240 - 249.]

Zhou, H., & Long, L. R. (2004). Statistical remedies for common method bias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6), 942 - 950.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 - 950.

The Effects of Marital Quality on Coparenting: A Cross-level Medi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mmon Fate Model

LIU Yiting[1], FAN Jieqiong[2], CHEN Bin-Bin[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ECNU Branch,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ssessment towards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Bronfenbrenner's ecosystem theory suggests that the different experiences of family members jointly shape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of the family, and there may be interdependences between two parents in a family. Previous literature aimed to solve research questions at the family or dyadic level, but their analyses were mainly conducte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o solve this issue, we adopted the common fate model (CFM), which better explains the interdependence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t the family or dyadic level. The common fate variable is modeled as a potential variable with two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common fate model,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ffect of family marital quality on the coparenting and the cross-level mediating role of the sense of parenting competence between couples. Questionnair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650 families including fathers,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ranging from 4 to 7 years old) in Shanghai kindergartens by using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marital quality positively predicted supportive coparenting and negatively predicted destructive coparenting within a family; (2) family marital quality positively predicted each parent's sense of parenting competence; (3) each parent's sense of parenting competence positively predicted supportive coparenting and negatively predicted destructive coparenting; (4) each parent's sense of parenting competence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marital quality and supportive and destructive coparenting. Higher marital quality in the family helped to increase each parent's sense of parenting competence, which in turn increased supportive coparenting and decreased destructive coparenting.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ross-level mediating effect of sense of parenting competence between marital quality and parental coparenting using the common fate model in a longitudinal study. It combined the family level (marital quality and coparenting) and the individual level (sense of parenting competence),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creating a good family environment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fate model.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application of the common fate model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families. The findings may hav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n the wellbeing of Chinese families.

Key words Marital quality, supportive coparenting, undermining coparenting,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the common fate model